

# 基于文化维度的“双减”家庭行动的作用机理及优化\*

刘超洋

(郑州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河南郑州 450044)

**摘要:** 基于文化维度,从家庭这一最小执行单位出发,分析文化对“双减”家庭行动的作用机理。发现权利距离的差异诱发阶层之间的结构紧张,对教育结果的不确定性规避诱发高风险投资,集体主义超越个人主义诱发从众心理,短期导向超越长期导向致使教育的经济理性泛化。基于此,家庭应采取的优化路径为:缩小权利距离差距,减弱对教育结果的不确定性规避,关注个人主义,重视长期导向。

**关键词:** 基础教育;“双减”政策;家庭行动;文化维度

**中图分类号:**G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380(2024)01-0074-06

## Mechanism and Optimization of “Double Reduction” Family Action from Cultural Dimension

LIU Chaoyang

(College of Education and Science, Zhe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Abstract:** Based on cultural dimension, starting from the “minimum unit” of famil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unctional mechanism of action culture on “double reduction” family. It finds that the difference in right distance induces “structural tension” among the classes, the uncertainty avoidance of educational results induces “high risk investment”, collectivism surpasses individualism induces “conformity psychology”, and short-term orientation surpasses long-term orientation causes “economic rationality” of education. Based on this, the corresponding optimization path is proposed as follows: narrowing the right distance between the classes, reducing the uncertainty avoidance of education results, paying attention to individualism, and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long-term orientation.

**Keywords:** Basic education;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Family action; Cultural dimension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强调校内要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校外要深化培训机构治理,以构建

教育良好生态,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双减”一时成为社会广泛讨论的热点。通过对目前“双减”教育政策相关论文的梳理,发现主要集中在“双减”教育政策价值方面、“双减”教育政策落实方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教育部青年课题“基于‘最小单位’视角的‘双减’教育政策执行研究”(EHA220538);河南省教育厅2023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教育‘双减’的家庭反应与影响研究”(2023-ZZJH-133)。

收稿日期:2023-11-03,修回日期:2023-12-03

面、“双减”教育政策配套机制方面等。现有的研究多集中在宏观理论层面的探讨,较少关注家庭这一单元主体,虽然有学者对“双减”政策实施初期父母的教育焦虑进行了分析,对做好家庭教育指导,从家庭需求视角对“双减”政策实施提出了优化建议,但是从文化维度分析“双减”政策家庭行动的研究极少,而家庭作为政策执行的“最小单位”,其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家庭的教育行为受一定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不同的家庭在不同的文化价值观中会产生不同的行为反应。当前,在家庭总体性文化资本对教育体系内的制度性效应尚属“黑箱”的前提下,剖析其作用机制将有助于寻找开启这一“黑箱”的关键。<sup>[1]</sup>因此,本研究从文化的视角出发,对“双减”教育政策背景下家庭行动的作用机理进行分析,并为家庭进一步采取合理的教育行动提出优化建议。

## 一、“双减”家庭行动分析的框架建构

吉尔特·霍夫斯泰德认为:所谓文化,就是不同群体之间相差异的共同心理程序,在这个程序中,他们会在一定的区域内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去思考、感受和行为。霍夫斯泰德在《文化与组织:心理软件的力量》一书中提出了“文化的五个分析维度”,即权力距离、不确定性回避、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长期和短期导向、阳刚气质—阴柔气质。<sup>[2]</sup>这一维度的界定为文化分析提供了清晰的框架并得到了学者的广泛认可,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它被大量地运用到了人力资源管理、消费行为等各个方面,也有研究表明这种分析方法在组织和个人层面的适用性上更加合理。目前,在教育研究领域运用该理论分析的研究较少,极个别文献运用该理论分析了文化价值观对于教育的影响,如贾丽敏等运用该理论分析了学校价值观的“守”与家庭价值观的“变”,以化解家校冲突;<sup>[3]</sup>陈涛等借此探讨了中国家庭文化价值观与影子教育选择的关系。<sup>[4]</sup>

从微观上讲,文化是一种共同的价值系统,它将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区分开来,可以说价值观是文化的基石。<sup>[5]</sup>家庭文化亦是高度抽象化的存在,其对教育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复杂性,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为深入分析家庭文化提供了框架。因此,本

研究基于该理论从家庭这一政策执行的“最小单位”出发,分析家庭组织中的文化对“双减”家庭教育行动的作用机理,以全面揭示“双减”背景下家庭行动背后的复杂因素,从而为家庭采取合理的教育行动提供优化路径。

本研究以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为理论架构,选取了“权利距离”“不确定性回避”“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长期取向与短期取向”四个维度来考察不同的家庭文化对“双减”家庭行动的作用机理与优化路径。如图1所示,在文化维度的框架内,四个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着“双减”背景下的家庭行动。其中,权利距离是指在一个特殊的社会结构中,弱势成员对于权利分配不平等的接纳程度。不同的文化群体对于不平等问题的看法表现为社会公正意识越高,则拥有越大的权力差距。不确定性规避是指个体在不确定的情形中感受到的威胁的程度;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是相对的一组概念,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个体与集体的关系也并不一样,个人主义社会强调突出个性,而集体主义社会强调集体目标;长期导向和短期导向体现了人们对时间的偏好,长期导向倾向于关注未来和长远,短期导向则注重过去和现在。<sup>[2]</sup>霍夫斯泰德的文化分析维度在对组织和个人层面的分析上具有一定的优势,家庭作为“双减”教育政策执行中的“最小单位”,具有其自身特殊的组织文化特征,本研究基于该理论建构分析框架,能够从文化的角度全面揭示家庭行动的作用机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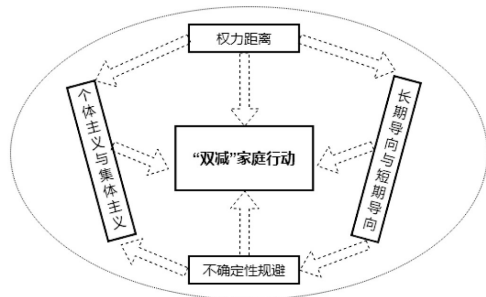


图1 文化维度下的“双减”家庭行动的作用机理分析框架

## 二、“双减”家庭行动的作用机理

为了解“双减”背景下家庭对于孩子教育行为影响的现实情况,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进行实证调研,以问卷星在线发放问卷,共回收问卷82

份,有效问卷77份,样本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通过将实证数据与理论分析相结合,探讨“双减”背景下家庭教育行动的作用机理。

表1 样本基本情况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18	23.38
	女	59	76.62
年龄	25岁以下	10	12.99
	26-30岁	2	2.6
	31-35岁	19	24.68
	36-40岁	23	29.87
	41-45岁	12	15.58
	46岁以上	11	14.29
学历	小学	8	10.39
	初中	36	46.75
	高中	15	19.48
	本科	15	19.48
	硕士研究生	2	2.6
	博士研究生	1	1.3
所在区域	城市	63	81.82
	农村	14	18.18

### 1. 权利距离的差异诱发阶层之间的结构紧张

权利距离可以反映不同群体对于不平等问题的态度,高公平感的人往往表现出较为积极的态度以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而低公平感的人则容易产生“偏狭”“嫌富怜贫”的阶层意识。<sup>[4]</sup>家庭背景、父母受教育程度、职业地位、户籍等都对个人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地位有重要影响,这不能排除有资本的因素,也不能排除是先天起点的“不平等”。<sup>[6]</sup>城市家庭大多为中产家庭,家长在“双减”后能利用自身积累的资源为子女继续提供相应的教育行为,公平感相对较高;而大部分农村家庭家长只能束手无策,对“双减”存在一定程度的“偏见”,进而产生消极的低公平感心理。调查显示,兴趣扩展课外辅导在城市的比例为29%,而乡村只有5.4%;排名前25%的家庭年生均课外辅导费用为8824元,是后25%家庭的6倍。<sup>[7]</sup>本研究中的问卷调查显示(表2),家庭收入与平均每月为孩子支付的教育费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相关系数值为0.54,说明家庭收入越高,为孩子支付的教育费用越高。

表2 家庭月收入与孩子教育费用支出情况

	平均值	标准差	您的家庭月收入	您平均每月为孩子支付的教育费用
您的家庭月收入	3.00	1.05	1	
您平均每月为孩子支付的教育费用	2.40	1.63	0.54*	1

注:\* $p < 0.01$

与其他家庭相比,中产阶层家庭教育焦虑较为严重,他们不仅面临着“阶层跃迁”的困难,也面临着“阶层下滑”的风险,为了维护现有的阶层位置,他们愿意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和费用为子女提供多样的教育;而农村家庭因家长的资源有限,在“双减”之后为子女提供的教育行为受限。调查数据显示,城市中15.87%的家长给孩子提供线上补习机会,其中4.76%的家长给孩子请家教补习,25.4%的家长找规模较小的机构给孩子补习;而农村孩子只能通过线上补习(21.43%)的形式,没有补习的占比为78.57%,远高于城市中没有补习的家庭。

“双减”背景下中产阶层家长的教育焦虑也并未得到根除,大部分家长依然利用各种资源为其子女提供教育行为,对于农村家庭家长而言,“双减”之后他们面临着更多的无奈。不同阶层间的差异容易诱发“结构紧张”,影响着他们的教育行动。“结构紧张”这一概念由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提出,他将这一概念定义为个人对成功的期望值和能够使他取得成功的社会结构之间的不平衡。在社会预期长期无法实现的情况下,会出现结构紧张,引发愤怒、压抑、仇恨等情绪,并在一定条件下演变为集体共有的“一般化信念”,对社会安定构成威胁。中产阶层家长的教育焦虑虽并未彻底消除,但因具备高公平感,能够凭借其积累的文化资本主动为子女寻求优质教育资源,如请家教或者送孩子出国;而农村家长在“双减”下表现出低公平感,只能听天由命,寄希望于学生的自觉,不同阶层家庭之间的权利距离差异明显,进而诱发结构紧张,影响着他们对子女的教育行为。

### 2. 规避教育结果的不确定性而诱发高风险



## 投资

不确定性规避是指个体在不确定的情形中感受到的威胁的程度,经常通过紧张感和对可预测性的需求表现出来。人们在不确定性规避的文化中会尽力避开不确定的情况,寻求一种确定的结构使事情的发展可以预测甚至把握。然而,教育具有长期性,学生的学习效果在短时间内难以得到全面的衡量,即便学生参与课外补习,也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够提升其学习效果,依旧面临着风险。家长对孩子的课外补习投入虽然是一种风险投资,但是在“高风险、高回报”观念影响下,部分家长依然愿意为孩子的课外补习买单。在“双减”政策实施之后,部分家长期望孩子获得较高的回报而设法让其参与补习,以规避未来的不确定性。在强不确定性规避的社会中,焦虑水平相对较高,反之则相对较低。

本研究的问卷调查中,在对“您对子女的教育问题有过‘焦虑’的情况吗”的分类统计中,20.63%的城市家长表示非常焦虑。大部分城市家长的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对其子女的教育期待也相对较高。从整体上来看,无论是城市家长还是农村家长,在“双减”之后的教育焦虑基本持平,城市家长中有55.55%认为非常符合或者比较符合,农村家长中则占57.14%。农村家庭中大部分父母的学历水平相对较低,家庭资本相对较弱,“双减”之后,他们一方面自己难以辅导子女作业,另一方面又难以负担子女高额的家教费用,相较于城市家长具有更高的焦虑感。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家长,大部分家长依旧力所能及地为孩子提供补习,以高风险投资来规避孩子前途的不确定性,即便是农村家长中也有21.43%为孩子选择线上补习。

### 3. 集体主义超越个人主义诱发从众心理

个人和集体是一对相对概念,不同的家庭文化背景下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也各不相同。个人主义是指人与人之间关系松散联系的社会,人们只照顾自己及其核心家庭,集体主义指人们处于强大而紧密的内群体当中。在大多数集体主义社会中,孩子所在的家庭是由父母、兄弟、姐妹等成员组成,文化人类学将其称为扩展型家庭,而在个人主义社会中,孩子所处家庭的成员较少,如独生子女家庭为典型的核心理家庭。在集体主义的家庭中,孩子个

人的意见不重要,他们要学会服从家长的安排;在个人主义的家庭中,孩子们能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在教育目标上的侧重点也并不相同,个人主义强调为社会培养独立的个体,侧重于让学生知道如何学习;而集体主义着重培养能被群体所接受的、具备良好技能和品格的人,学习常常被视为是一次性的过程,侧重于让学生知道如何做。

我国属于典型的集体主义社会,家庭文化受集体主义观念影响也较大,每个家庭以其自身为中心,与亲朋好友、邻居、同事等社会成员形成了联系密切的“大集体”。长期处于集体主义的社会中,容易产生从众心理。受“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思想的影响,大多数家长期望自己的孩子能够通过教育获得美好的未来,从而导致盲目的学业比拼,在“赢在起跑线”的大众压力下进一步引发剧场效应,进而加剧内卷。在问卷调查中,在“您看到别的父母在教育上大量投入,您也忍不住这样做”统计中,14.29%的家长认为非常符合,29.87%的家长认为比较符合;54.54%的家长会将孩子的成绩与班上的同学进行比较;61.04%的家长看到周围人的孩子十分优秀会感到有压力。在集体主义社会中,成员之间不断比较,忽视对于个体价值的关照。“双减”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教育内卷,但是大部分家长受集体主义观念的影响根深蒂固,依然存在补习的从众行为。

### 4. 短期导向超越长期导向而致教育经济理性的泛化

长期导向和短期导向主要反映人们的时间偏好观念,长期导向注重未来的收益,如将节俭和毅力视为美德,注重储蓄和投资;而短期导向则注重现在和过去,如及时行乐和消费。<sup>[2]</sup>在教育领域,长期导向注重对学生全面发展能力的培养,而短期导向更加关注学生学习成绩的提升。学校教育往往是长期导向,注重对学生能力的培养,然而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课外补习是典型的短期导向,在短期内有助于学生成绩的提升,但从学生发展的长远角度来看,不利于学生全面成才。在问卷调查中,虽然家长认识到全面发展的重要性,90.91%的家长表示关注孩子的全面发

展,但是在“您平时只关注孩子的学业成绩”的问题中,却有33.76%的家长表示平时只关注孩子的学业成绩,表明部分家长依然重视孩子的学业成绩,并未完全以长期导向的全面发展的观点看待孩子。

虽然现代教育有着强烈的理性追求的特征,但在实践过程中,由于过于注重功利以及相应的评价与测量,致使经济理性/工具理性占据了主导地位,窄化了教育内涵,导致教育变质。<sup>[8]</sup>“双减”之后,社会竞争并未明显减弱,不少家庭为使子女更具有竞争性,依然选择短期导向的课外补习。当越来越多家庭把重心转移到校外教育,便逐渐丧失了以长期导向为主的学校教育的公共理性。经济理性的泛化必然削弱教育的公共理性,导致不同家庭之间盲目竞争,不断为子女提供课外补习。

### 三、“双减”家庭行动的优化路径

家庭文化影响着家庭教育行为的选择,基于对文化维度的“双减”家庭行动作用机理的分析,应缩小权利距离、减弱对教育结果的不确定性规避、关注个人主义、重视长期导向,以便在“双减”背景下为孩子提供良好的家庭文化氛围,进而促进孩子全面发展。

#### 1. 缩小权利距离差距以缓解阶层之间的结构紧张

权利距离反映出不同家庭对于不公平的态度,进而影响着家庭的教育行为选择。家长应该对教育树立高公平感,避免因低公平感带来的消极影响。受“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教育仍被视为分层的工具,中考时的普职分流就被认为是对学生进行分层,考分低的学生被分层到中职,成为“低人一等”的职校生。<sup>[9]</sup>家长应该树立平等的职业观念,尊重学生的兴趣爱好与发展需要,为学生营造宽松自由的家庭成长空间,打造权利距离适当的家庭文化氛围。虽然当前我国的阶层流动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向,农民阶层的规模不断减小、中产阶层的规模日趋增大、新社会阶层涌现“土字型社会结构”,<sup>[10]</sup>但是职业歧视、阶层固化的社会矛盾依然存在,家长应该树立平等的职业观念及社会阶层观念,以缓解阶层之间的结构紧张,进而为子女选择适当的教育行为。

#### 2. 减弱对教育结果的不确定性规避以减少“高风险投资”

对教育结果的不确定性规避影响着家长为子女提供的教育行为,在高不确定性规避的家庭文化氛围中,家长容易产生教育焦虑,进而为子女提供过多的教育行为,反之,家长的教育行为选择相对理性。家长应该树立正确的学生发展观,走出传统教育观念的误区,更新学生评价观念,不“唯分数、唯升学”论,以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衡量学生,重申教育的最终目的是指向学生成“人”,而非仅仅关注学生的学业成绩。此外,家长应该认识到教育的长期性以缓解自身的教育焦虑,树立百年树人的育人观念,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学生,给学生足够的成长时间和空间,克服短期、急功近利的功利化倾向,避免拔苗助长的教育补习,学会用独特的视角挖掘孩子的闪光点,做到扬长避短,从长远的角度帮助其规划未来发展,以减弱对教育结果的不确定性规避,进而减少对学生的高风险投资。

#### 3. 关注个人主义以避免教育选择的从众心理

在集体主义家庭文化观念影响下,家长容易与周围群体进行盲目比较,容易产生从众心理,为学生提供额外的教育行为;在个人主义的家庭文化观念下,家长更加关注学生作为个体的发展,较少与其他群体进行比较,盲目攀比的从众心理较弱。家长应该关注学生作为个体的个人价值的实现,减少与周围群体的比较。在信息获取途径日益便捷的当今,家长每天都会受到海量信息的冲击,在真假混杂的信息裹挟中,家长容易丧失自我判定能力,从而人云亦云地为学生选择过量的教育行为。在信息大爆炸时代,有些媒体为博眼球而刻意贩卖焦虑,抓住家长期望孩子成才心切的心理而故弄玄虚制造恐慌。家长应该培养一定的信息鉴别能力,关注个人主义以避免在教育行为的选择中盲目从众,冲破由不良信息编织的信息茧房的束缚,为学生提供适合其个体发展的教育行为。

#### 4. 重视长期导向使教育回归公共理性

在短期导向的家庭文化观念下,家长注重对子女的短期投入与回报,以学生学习成绩的提高为目的而选择教育行为;在长期导向的家庭文化观念下,家长注重对子女的长远规划与发展。家长应该

树立长期导向的教育观念,正确认识教育的公共理性,克服受经济理性支配而盲目追求教育短期效益的狭隘观念。家长应根据家庭情况为学生选择适当的第三课堂,为学生的长远发展提供机会。第三课堂主要是在学校教育之外进行,旨在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素养与正确的行为习惯,是帮助学生树立远大理想信念、提升学生社会实践能力的创新模式。家长在对子女第三课堂的教育中具有一定的便捷性,可以利用寒暑假时间,带子女到红色旅游基地、科技馆、美术馆、养老院等地参观学习,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与服务,以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实践能力,使教育重新回归公共理性。

#### 参考文献

- [1] 谢爱磊,洪岩璧.社会资本概念在教育研究中的应用——综述与评论[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7,38(1):21-30.  
XIE Ailei, HONG Yanbi. The Concept of Social Capital and its Application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a Critical Review [J]. Tsinghua Journal of Education, 2017,38(1):21-30.
- [2] [荷兰]吉尔特·霍夫斯泰德.文化与组织:心理软件的力量[M].李原,孙健敏,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NL] HOFSTEDE G. 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s: Software of the Mind [M]. LI Yuan, SUN Jianmin, trans.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2010.
- [3] 贾丽敏,姬梁飞.家校冲突:学校价值观的“守”与家庭价值观的“变”——基于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理论的分析[J].上海教育科研,2022(10):19-23.  
JIA Limin, JI Liangfei. Home-school Conflicts: Stable School Values and Changing Home Values— Analysis Based on Hofstede’s Theory of Cultural Dimensions[J]. Journal of Shanghai Educational Research, 2022 (10): 19-23.
- [4] 陈涛,巩阅瑄,李丁.中国家庭文化价值观与影子教育选择——基于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的分析视角[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9,17(3):164-186.  
CHEN Tao, GONG Yuexuan, LI Ding. Chinese Family Cultural Values and Choice of Shadow Education: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the Hofstede’s Cultural Dimensions [J]. Peking University Education Review,2019,17(3):164-186.
- [5] KIRKMAN B L, LOWE K B, GIBSON C B. A Quarter Century of Culture’s Consequences: A Review of Empirical Research Incorporating Hofstede’s Cultural Values Framework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6(3):285-320.
- [6] 杨金东.结构紧张与公平隐忧:“双减”政策的阶层反应与可持续发展研究[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39(6):121-126.  
YANG Jindong. Structural Tension and Underlying Concerns over Educational Equity: A Study of the Stratification Response to the “Double-reduction” Education Policy and I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J]. Journal of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2022,39(6):121-126.
- [7] 王蓉.中国教育新业态发展报告(2017)[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WANG Rong. Annual Report on New Types of Education Suppliers (2017) [M]. Beijing: Social Science Academic Press,2018.
- [8] 王学.教育功利性取向的德性反思[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28-37.  
WANG Xue. A Moral Reflection on the Utilitarian Orientation of Education [J]. Journal of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2021(2):28-37.
- [9] 熊丙奇.“双减”需要进一步解决四大问题[J].上海教育评估研究,2022,11(1):22-25.  
XIONG Bingqi. “Double Reduction” Needs to Further Solve Four Major Problems [J]. Shanghai Journal of Educational Evaluation,2022,11(1):22-25.
- [10] 严飞.分化与流动:我国社会结构与社会心态变迁(1978-2020)[J].求索,2021(6):96-103.  
YAN Fei. Differentiation and Mobility: The Change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Social Mentality in China (1978-2020) [J]. Seeker,2021(6):96-103.